
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养老资源供给及风险感知研究

——基于江苏省淮安市的调查分析¹

郭睿恬，仲翔宇，黄新菊

（南京农业大学，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基于江苏省淮安市的调查数据，考察了第一代返乡农民工的养老资源供给及风险感知现状。研究发现，第一代农民工返回家乡后在自我、家庭、政府这三大养老资源供给上均有不足。与一般农民相比，他们的养老资源更为匮乏，养老存在较大风险。但由于对政府的信赖度低和对子女家庭的妥协，他们忽视了政府和家庭带来的潜在风险且未来养老规划不足。因此，政府需加强政策扶持，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工返乡收入，保障晚年生活。

【关键词】：返乡农民工；养老资源；风险感知

【中图分类号】：D669.6 **【文献标识码】：**A

1、问题与背景

近年来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的主力，20 世纪 80 年代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囿于各种制约已经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选择返回了家乡，这类群体被统称为第一代返乡农民工。作为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曾经投身于经济建设，为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却缺乏社会养老保险、医保、福利等基本保障。目前学术界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研究较为有限，尤其是他们返乡后的养老研究显得更为紧迫。

养老资源是指可以用来进行养老保障并能产生保障效果的东西。它既可以是资金、物品，也可以是服务、机会、关照和支持气氛，或者是有利于老年贫困者走出困境的政策及其他具有养老保障价值量的东西。黄乾认为在人口结构转变、制度变迁、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不论是自我资源、家庭资源还是制度性资源都处于匮乏状态。

“风险社会”是人们审视 20 世纪末期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走向的一种基本视角，风险的本质是不确定性，既是客观存在，也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然而，相对于现实生活的压力和对疾病风险的担心来说，农民在自己的养老问题上并未像许多学者那样表现出强烈的忧虑。这是一个需要反思及警惕的问题，尤其是第一代返乡农民工游离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生命历程，使他们的养老风险不容小觑，他们自身对不同类别资源供给的风险感知程度则成为本研究着重探讨之处。

2、研究设计与样本概况

2.1 概念界定

¹[收稿日期]：2018-04-22

[基金项目]：南京农业大学 2017 年“校级 SRT 计划”项目（1728A16）。

[作者简介]：郭睿恬（1997-），女，天津人，2015 级本科生。

本研究将“第一代农民工”界定为 20 世纪 80 年代初到 90 年代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当前这一类人群由于打工多年，大多数已经处在退休养老的年纪，出于年龄等原因面临着返乡的必然需求。基于现实情形及研究的可行性，本研究所调查的第一代返乡农民工是指年龄处于 50~70 岁之间，在改革开放之后外出打工而现在回到家乡，处于养老临界点的群体。

2.2 研究地点

本次研究地点选择江苏省淮安市，淮安作为一个劳务输出大市，拥有数量极其庞大的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据调查统计，全市 2015 年外出务工人员共有 90.9 万人，其中返乡农民工人数为 13.6 万，占外出务工人员总量的 15%。淮安作为苏北中心城市，近年来经济不断发展，作为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基于淮安的调查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

2.3 研究方法 with 样本概况

本研究将采用多层分阶段抽样的方法，按照人均 GDP 排序在淮安所辖乡镇中按照系统抽样方法抽取三个乡镇，在每个乡镇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抽取两个行政村共六个行政村，在每个行政村内再运用系统抽样方法抽取 30 位农村居民发放问卷，实地发放 180 份问卷，有效回收 162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0%。样本基本构成情况见表 1。

表 1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n=162）%

基本情况		百分比
性别	男	67.1
	女	32.9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38.3
	初中	45.6
	高中及中专	14.2
	大专及以上	1.9
健康状况	很好	36.5
	较好	28.0
	一般	26.2
	不太好	9.3
返乡年限	10 年以下	70.7
	10~19 年	17.2
	20 年及以上	12.1

如表 1 所示，随着自身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第一代农民工选择了近五年返回家乡，这其中正体现着一种“落叶归根”的朴素思想。而且第一代农民工自身普遍较低的文化水平已经限制了他们在日新月异的城市中的长久发展，他们的工作长期处于高强度快节奏状态，自身压力大，整体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因此在老年阶段到来之际他们更愿意选择返乡养老。

3、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养老资源供给分析

本次研究将养老资源的供给对象分为自我供给、家庭供给和政府供给三部分，综合探讨他们返乡后的养老生活情况，以便寻求他们的养老风险。

3.1 自我供给

自我供给主要考察农民工的经济能力，第一代农民工由于长期的外出打工经历，其经济收入及自我储蓄都较一般的农村老人有所不同。表2为第一代农民工在返乡后的职业及收入情况。

表2 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后职业及收入情况（n=162）%

职业及收入情况		百分比
最主要收入来源	当前职业	70.0
	子女支持	6.3
	土地收入	5.6
	返乡前储蓄	6.3
	退休金	11.3
	政府补贴	0.6
	第一产业	14.0
返乡后职业领域	第二产业	29.3
	第三产业	56.7
	收入减少	42.7
返乡后的收入变化	没有变化	10.2
	收入增加	47.1

如表2所示，仍有70%第一代农民工在返乡后以当前职业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他们在返乡后很少选择务农。中国目前有大量农地转化为非农生产用地，导致返乡后的农民工群体的土地利益被损害，只能选择仍在返乡前务工的领域内二次就业。但他们的收入并不稳定，与返乡前的收入相比，增加和减少的群体各占一半，返乡后的自我供给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经济风险。

同时，虽然农民工有长期外出打工的经历，但在返乡后能把外出打工的储蓄作为自己主要收入的只占到了6.2%。推测原因是农民工打工所得收入大多用于子女教育及生活开支，且城市消费水平较高，较难形成大量的储蓄用以返乡养老。总体来看，本研究中大部分人的自我经济供给能力仅限于维持生活且存在较大的不稳定性。

3.2 家庭供给

子女是家庭养老资源中必备的条件，这其中包括足够数量的子女，在缺乏其他资源的情况下，子女数量是决定养老供给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以及子女的利他倾向，子女要有抚养老人的意愿。表3为第一代返乡农民工的家庭情况。

表3 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家庭情况（n=162）%

家庭情况		百分比
是否有独生子女	是	37.0
	否	63.0

是否与子女居住	是	27.8
	否	72.2
生病时子女的照顾形式	亲自护理	20.7
	给现金或买食物	55.2
	无任何照顾	14.1
	其他	10.0

从表 3 可以看出, 37%的农民工只有一个孩子, 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农村家庭子女数量正在不断减少。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跟随父母的脚步已经大量涌入城市。农民工年老后返乡, 但他们的子女依旧留在城市发展, 他们大多无法与子女共同居住。

在他们生病时, 只有 20.7%的农民工子女可以做到亲自照顾, 更有 14.1%的子女由于时间和能力上的限制无法对父母有任何形式上的照料。在此情况下, 家庭供给资源不断缺失, 农民工返乡养老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需求均难以得到满足, 传统家庭养老能力的弱化给他们的养老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3.3 政府供给

政府供给指国家或者政府以法定的形式在国民进入老年阶段后向其提供养老资源, 主要表现为国家提供的社会养老保险、养老救济等。表 4 为第一代返乡农民工购买社会保障的情况。

表 4 第一代返乡农民工购买社保情况 (n=162) %

购买社保情况	频率	百分比
打工时是否购买社保	是 49	30.2
	否 113	69.8
返乡后是否购买新农保	是 104	64.2
	否 58	35.8

表 4 表明, 绝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在外出打工时没有购买社保。主要原因是农民工自身的文化水平较低, 社会保障意识不强。此外, 农民工的工作流动性强, 工作跳槽后无法续接的情况也导致了部分人中途退保。

64.2%的第一代农民工在返回家乡后购买了新农保, 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打工时社会保障的缺失, 但是这个参保率并未能达到全面覆盖。新农保每月为当地农民供给 115 元, 这对于伤病较多的农民工来说并不够。养老金作为农民工晚年的一项固定收入, 它的缺失加大了他们的养老风险。

4、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养老存在的风险

返乡农民工的风险感知是指返乡农民工基于自身条件, 对自己老年基本生活所面临问题的一种主观上的合理估计与担心程度。本研究认为, 第一代农民工在面对返乡后的养老问题时, 会因自身现有的养老资源供给, 对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有不同程度的感知和忧虑。

4.1 自我供给资源的风险感知

由图1可见，第一代返乡农民工担心的问题集中在劳作无人帮忙和收入低这类与经济密切相关的问题上。调查可知，第一代农民工返乡后尽管仍从事与之前类似的工作，但过半农民工收入都低于返乡前水平，自身储蓄和微薄收入仅能满足目前生活需求却无法成为老年生活的保障。48.42%的农民工都对未来养老自我经济供给的情况感到担忧，在自我供给资源的供给上，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存在着较高的风险感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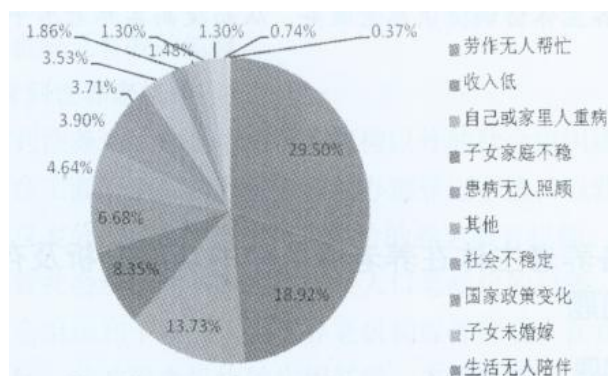


图1 第一代返乡农民工群体担心问题类别 (n=162)

4.2 政府供给资源的风险感知

图1显示，与经济供给问题相比，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对自己或家里人患重病这类健康医疗问题的担忧略显不足。由于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劳动科学性较差，常常造成各种“职业病”，身体健康状况欠佳，而且大多数农民工返乡后仍二次就业于承担健康风险的体力工作，对他们而言健全的医疗保障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关键，但是打工时和返乡后他们购买社保的比例却都不高。

目前第一代农民工对社会医疗保障的意识虽有所提高，但仍未对此全面重视。一方面是因返乡农民工面临更为急迫的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较为传统的养老观念及其从来都不敢对国家与社会解决养老保障途径抱有预期的影响。因此，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对政府供给资源的风险感知和对政府的信赖度亟待加强。

4.3 家庭供给资源的风险感知

当下农村子女数量的减少和生活空间的分离，使家庭供给资源匮乏，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正逐渐弱化。但在本次调研中却发现，第一代农民工对家庭资源的缺失并没有表现出担忧，而且相比于家庭中子女对自己的陪伴和照顾功能，他们更看重子女家庭的稳定程度。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正是希望能给子女带来更好的生活，目前集中在年轻一代身上的养老压力让老人忽视了家庭对自身的支持能力，以自身承担的风险来换取子女家庭的稳定。

4.4 主观未来风险感知

需要关注的是，本研究调查得知第一代返乡农民工群体中 57.2%的人很少担心或从未担心过养老问题，74.3%的人从未有过未来的养老规划，由此可见第一代返乡农民工都普遍缺少对未来养老的风险认知和规划认识。

5、小结与思考

本文通过对江苏省淮安市 162 名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养老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第一代农民工返回家乡后在自我、家庭、政府这三大养老资源供给上均有不足，养老存在较大风险。由此，本研究得出三点结论。

第一，第一代返乡农民工相较于一般农民养老资源更加匮乏。一方面，农民工返乡后收入来源不稳定、打工时自我储蓄不足，较难形成充裕的自我养老资源供给。另一方面，农民工自身流动性强、文化水平低等特点造成他们的社会保障参与率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他们难以享受均等化的政府供给资源。

第二，第一代返乡农民工自身风险感知缺失及养老规划不足。农民工看重自我供给资源，但对政府的信赖度低，缺乏政府供给资源的风险感知。他们对客观子女家庭条件的妥协忽视了家庭的支持作用，并且普遍缺乏对未来养老的规划。

第三，政府应加强对第一代返乡农民工养老风险的保障。在农民工缺乏主观风险感知的情况下，从根本上提高农民工收入，加大新农保覆盖率及待遇水平，将第一代农民工彻底融入新农村的建设中，保障晚年生活。

[参考文献]:

[1]谭昊林, 陈婷. “世界办公室”之盼[J]. 知识经济, 2004 (5) : 68-70.

[2]黄乾. 农村养老资源供给变化及其政策含义[J]. 人口与经济, 2005 (6) : 55-59.

[3]张成福, 陈占锋, 谢一帆. 风险社会与风险治理[J]. 教学与研究, 2009 (5) : 5-11.

[4]乐章. 风险与保障: 基于农村养老问题的一个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05 (9) : 68-73.

[5]钟涨宝, 李飞, 冯华超. 养老保障能力评估对农民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 5 省 1573 个样本的实证分析[J]. 人口与经济, 2016 (6) : 72-81.